

国家教育部

社科基金项目 (96JAP750.11-44042)

中国 20 世纪文学现代品格论

主 编 黄曼君

副主编 吴建波 樊星

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

目摇摇录

导论	员
摇摇一、生命“自己”：中国 圆园世纪文学现代品格的本体特征 ...	员
摇摇二、生命“链接”：中国 圆园世纪文学现代品格的阐释形态 ...	怨
摇摇三、生命“重构”：中国 圆园世纪文学现代品格的 当下镜像	员猿
第一章摇观念新变	圆园
摇第一节摇现代文学观的发生	圆园
摇摇一、“现代”概念界说	圆园
摇摇二、现代文学观的发生背景	圆源
摇摇三、现代文学观的基本内涵	圆苑
摇第二节摇现代文学观的转换模式	猿
摇摇一、断裂与反传统	猿
摇摇二、现代化与革命化	猿
摇摇三、民族化与大众化	猿
摇第三节 现代文学观的主流形态	源
摇摇一、现代文学观的大势所趋	源
摇摇二、影响和制约现代文学观演变的因子	源
摇摇三、现代文学观的主流形态	源
第二章摇思潮嬗递	源
摇第一节摇现代文学思潮的演变轨迹	源
摇摇一、圆园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思潮	源

摇摇二、20 世纪下半叶的文学思潮	绪论
摇摇三、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思潮状况	绪论
摇第二节摇现代文学思潮的张力结构	绪论
摇摇一、“中外古今”的张力关系	绪论
摇摇二、“左中右”、“上下”的张力关系	远源
摇摇三、“歌颂与暴露”的张力关系	远源
摇第三节摇现代文学思潮的矛盾运动	远论
摇摇一、自由与规范：“一”与“多”的潮起潮落	远论
摇摇二、促进与促退：文论与创作的平衡与失衡	远论
摇摇三、相吸与相斥：不同思潮之间的融会与冲突	远论
 第三章摇语言沿革	愿愿
摇第一节摇五四白话文理论	愿愿
摇摇一、五四白话文	愿愿
摇摇二、五四白话文与白话文学	愿源
摇第二节摇语言转向：从文言到白话	愿愿
摇摇一、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与晚清白话文学运动	愿愿
摇摇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三四十年代大众语文运动	愿愿
摇第三节摇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	愿圆
摇摇一、现代汉语的现代性	愿圆
摇摇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愿愿
摇第四节摇现代文化冲突与现代文学选择	愿源
摇摇一、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化冲突	愿源
摇摇二、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选择	愿圆
摇第五节摇 20 年代新名词与 30 年代新话语	愿远
摇摇一、新名词与新话语作为历史现象	愿远
摇摇二、新名词与新话语作为语言现象	愿源
 第四章摇文体蜕变	员猿
摇第一节摇文体与文体的蜕变	员猿

摇摇一、作为体裁的文体	猿猿
摇摇二、近代文体改良	猿猿
摇摇第二节摇摇现代文体的建立	猿猿
摇摇一、白话文学语体的确立	猿猿
摇摇二、现代文体系统的蜕变（上）	猿猿
摇摇三、现代文体系统的蜕变（中）	猿猿
摇摇四、现代文体系统的蜕变（下）	猿猿
摇摇第三节摇摇现代文体范型的确立与流变	猿猿
摇摇一、现代文体范型的确立	猿猿
摇摇二、文体的归化与僵化	猿猿
摇摇三、新时期文体意识的复苏和发展	猿猿
 第五章摇摇风格竞妍	猿猿
摇摇第一节摇摇世纪文学风格的发生和演进	猿猿
摇摇一、主体性的确立与风格意识的自觉	猿猿
摇摇二、从古典到现代：打破和谐	猿猿
摇摇三、从个性的张扬到隐逸	猿猿
摇摇四、新时期：回归与超越	猿猿
摇摇第二节摇摇崇高与悲剧的互动	猿猿
摇摇一、时代激情与崇高的主旋律	猿猿
摇摇二、批判理性与悲郁的文风	猿猿
摇摇三、英雄主义及其反动	猿猿
摇摇第三节摇摇文学风格的现代多元形态	猿猿
摇摇一、唯美与优美	猿猿
摇摇二、幽默与讽刺	猿猿
摇摇三、焦灼与荒诞	猿猿
摇摇四、浑融与消解	猿猿
 第六章摇摇批评转型	猿猿
摇摇第一节摇摇现代转型的世纪性进程（上）	猿猿

摇摇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古典形态	猿园
摇摇二、世纪之交文学理论批评的过渡性特征	猿缘
摇摇三、五四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勃兴	猿园
摇第二节摇现代转型的世纪性进程（下）	猿源
摇摇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兴起与发展	猿源
摇摇二、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多元开放局面	猿员
摇第三节摇现代转型的总体性特征（上）	猿愿
摇摇一、审美的社会价值论观念	猿愿
摇摇二、注重主观选择的理论形态与批评类型	猿缘
摇第四节摇现代转型的总体性特征（下）	猿远
摇摇一、趋于科学化的思维方式与概念、范畴系统	猿远
摇摇二、多元共存、互补交融的两岸四地文学理论批评格局	猿猿
 第七章摇通俗新质	猿缘
摇第一节摇通俗文学的现代品格	猿缘
摇摇一、世俗理性	猿远
摇摇二、市场机制	猿愿
摇摇三、读者至上	猿园
摇摇四、娱乐功能	猿愿
摇摇五、传统创新	猿员
摇第二节摇通俗文学的现代转型	猿源
摇摇一、疏离政治，强调消闲	猿缘
摇摇二、超越传统，推陈出新	猿员
摇第三节摇走向新时期的通俗文学	源猿
摇摇一、走向市场的通俗文学	源猿
摇摇二、“新武侠小说”的现代品格	源远
摇摇三、“新言情小说”的现代品格	源员
摇摇四、“王朔现象”的现代品格	源员
 第八章摇中外遇合	源员

导 论

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加剧。在“欧风美雨”的猛烈冲击下，中国文学从古代文学传统中蜕变出来，形成一种新的生命之流。这种生命之流囊括了理性与感性、客体与主体、启蒙与审美、政治与艺术、崇高与悲凉、雅与俗、生理与社会、灵与肉种种不同视角构成的矛盾关系；同时它又“自决”、“自性”，作为一个完整“身体”的“自己”而存在，它在丰满本真生命的自我肯定与狂欢中超越自身，超越种种“逻各斯”中心而呈现出不可遏止的生命力。经过几代人的思考和运作，它形成了某些现代性品格特征。而从它本身的生命性来观照，对这种现代性品格，既要看到它某种生命本体形态，又要注目于它在被阐释关系链接中生命力的动态呈现，还要以鲜活的当下性言说实现历史视域的重新整合，以达到对其生命特殊本体的概括。我以为，“视界融合”的这几个维度将大大有助于从生命之流的视野对中国 20 世纪文学的现代品格进行动态考察。

一、生命“自己”：中国 20 世纪文学现代品格的本体特征

生命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个完整“身体”的“自己”而存在。文学是人学。新文学作为一种人学，它也是人的对象化、生命化。因此，新文学作为一种生命化的对象，是一个活泼泼、常动不息的生命系统、生命流程。新文学这个生命“自己”，它“自决”、“自性”，有自己作为文学生命产生的源流、根据和规律，但它作为一种生命，不是绝对的、抽象的、封闭的东西，它既是生理身体，又是社会身体；既是文学生命，又是超文学生命；既是个我主体，又是大我主体。它必然通过身体、自己与自然寻索、价值诉求、伦理正义相沟通，新文

学必然于“自决”、“自性”中蕴涵着社会、民族、国家，蕴涵着人类、世界、宇宙。当然，这社会是正在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社会，这民族国家是现代民族国家，这人类是新发现的人性视野中的人类，这世界是全球化视野中的世界，这宇宙也是 20 世纪动的宇宙观中的宇宙。而新文学这新的生命之流的“新”，就新在它所具有的“现代性”上。

关于对现代性的理解，海内外学者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现代性”与西方启蒙主义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是启蒙运动制造了现代性话语，或者说现代性话语的核心内容集中地体现了启蒙精神。这种体现了启蒙精神的现代性话语，主要特点有三：第一，从人文内涵来说，主要是主体性的强调，即人为自己立法，否定超验原则和传统规范，从个人自主性的扩大，开辟了以自身的内在性认识外在世界的道路。第二，从科学精神来看，则为理性原则的确认。即将现代性看作不断理性化、祛魅的过程，它是合理性的产物，是人按照自身的理性，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建构起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并与人的主体和合理性世界相适应，建立起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新的知识模式和谱系。第三，从发展路径上看，现代性具有反思性和多元性特点。即现代性是通过反思呈多元态势向前发展的。如审美现代性就是从现代性的整体特征中，特别是从现代性的反思性与多元性的特征中产生的。它是一种特殊的现代性形态：与启蒙现代性相对立并与之保持着张力关系。它从审美之维出发，为主体立法，立足于俗世此岸、当下此在，重视感性生命、直觉灵性。它是文学营造个体审美世界、发挥艺术原创性的重要源泉；同时，这种强调感性生命的审美现代性又是整个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还要看到的是，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除审美现代性之外，在许多情况下与审美现代性交融在一起，还出现了种种非现代性和反现代性思潮。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弊端日益显著，近代文化呈现出重大危机，这便在反思中加强了对近代文化的反叛，有强调非理性的意志、欲望，倡言诗意沉醉、酒神精神，以质疑于启蒙主义、反抗理性的，如尼采、叔本华；有批判理性逻辑之思，主张思与

诗的对话，认同于人类思想文化的诗性转向的，如海德格尔；有尖锐地看到社会现代化与其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反对科学认知的工具理性和道德伦理的实践理性，主张艺术具有反对理性主义的世俗“救赎”功能的韦伯；有揭示大工业社会将人异化为“单面人”，提倡以“审美经验”阻止人成为劳动工具的马尔库塞；还有将审美看成具有超越陈旧平庸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能力，崇尚暂时美、特殊美、惊奇美的波特莱尔、王尔德；……与上述思潮同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又与这些思潮很不相同的还有几种思潮，例如，有皈依于苏格拉底、孔子、耶稣、释迦等人类“轴心期”人文道德精神，连同理性与非理性、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一同反对的，如美国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实际上是新古典主义）；有反权威、反中心，主张颠覆、解构和边缘化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德里达、詹明信、吉登斯等。

上述现代性以及现代性进行的反思和批判，在西方形成了两种思想体系，以至于有的学者将它们称为“两个西方”。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上看，诸多批判现代性的思潮并未颠覆现代性，毋宁说是使现代性在矛盾张力场中进一步得到了更新和发展。因此，从全球化的视野看，它还只是一种形态的全球化。我们知道，所谓全球化，是现代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现代性重大事件，它从社会、个人、国际关系和全人类四个维度全面展开，由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结构性扩张而达成。上面种种思潮正是与西方这种全球化扩张相伴相生，而且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但是，还有另一种形态的全球化，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所展示的全球化格局。马克思主义并非否定西方启蒙主义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也不是没有对现代性进行过反思和批判。相反，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较之于任何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更充分地肯定与评价了现代性，也更深刻充分地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但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整体上看，它的全球化是另一种全球化。两种全球化虽然有互相渗透交融的一面，但本质上却是相互区分并时时处于对峙和冲突之中的。

这样，摆在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面前并使其身临其境的是两种现代性、两种全球化的复杂局面。正是在这种复杂局面中，中国 20 世纪新文学现代品格的一些特征从如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来：

1. 现代性：中国 20 世纪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向选择特征

我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转折、变化的条件下，在中外文化思潮、文学思潮的空前冲撞、汇合中，在宏大的传统和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参照系统之中形成的。现代中国文学将自身置于全球现代化和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这一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鲁迅说：“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旧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其中就包括“文化之业”^①。当然，正如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模式选择一样，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也有一个如何在现代与传统、外国与本土的维度上实现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向选择问题，也就是有一个将现代意识、现代思维方式与民族精神、民族形式结合起来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学的现代品格问题。中国现代化由器物到制度进而进入思想文化层面是在中西文化汇合空前加剧的甲午中日战争后维新改良运动时才开始的。文学的现代化也应该说是这个时候起步的。五四时期是激烈地反传统和全方位向西方开放的时期，然而也是自觉地、创造性地继承和转换传统最有成效的时期。五四时期的现代思想启蒙，既包括热烈地追求个性解放、倡导科学与民主、张扬理性精神、呼唤改造国民性，又主张人们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建功立业，具有参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文学本身的发展上，既认定文学自身独立之价值，又不忽视文学社会政治功能，同时更应具有“世界民”的人性的眼光。滥觞于近代，形成于“五四”的五四精神和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现代性”的转型模式，影响深远。正是这种转型模式及其在各个时期的变异、丰富和发展，形成了贯穿现代中国文学的以现代化追求为旨归的现代品格

^① 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鲁迅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49 页。

特征。这种现代品格特征，从人文精神和思想内涵来说，以爱国主义、民主主义为旗帜，注重时代性、意识形态性的同时，又楔入民族灵魂重铸的核心，注重人格独立、人性解放、生命意识的深层揭示。从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看，以现实主义为主，又有着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多元发展和交织融合。在总体审美特征上，有着崇高、悲凉、焦灼、和谐等多重审美特征的并存互渗，加以文体形式上，各种文体实验、多种话语体系以及白话文作为文学语言所激活的生命力……这些特征共同铸造了现代中国文学主流突出而又形态多样的现代化品格。

2. 革命性：中国 20 世纪文学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两种现代性、两个全球化的世界文化背景，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或“现代品格”的独特内涵，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文学的革命性叙述问题。大家都知道，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叙述中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革命性叙述。从梁启超到资产阶级革命派文学，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到左翼文学运动、工农兵文艺运动都采取了明显的革命性叙述。在这一革命性叙述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有着深厚的文艺修养、新的知识结构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参加到革命性叙述的文学行列中来，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周扬、冯雪峰、毛泽东、何其芳、赵树理、孙犁等。他们认为文学是革命的一部分，或革命的工具，文学理论批评是意识形态性强的文学阐释、评价和规范活动，他们都程度不同地关注文学的审美特性，但在文学的审美特征要从属于文学的革命性叙述上则是较为一致的。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另一个全球化的影响，他们不仅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影响，更受马列文论的影响，当然也有着自己与中国社会实际和文艺实际相结合的创造，其中一些重要成果，如鲁迅后期的杂文，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体系，茅盾长短篇小说和文学批评活动，郭沫若的历史剧，周扬、冯雪峰、何其芳的文艺论著，赵树理的坚持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小说，孙犁的风格独特的小说等。一些民主主义作家如巴金、老舍、曹禺等，他们的反帝爱国精神，其作品中反封建的深广内涵，都不能不说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叙述有关。如上

所述，在反帝救亡成为现代主题的情形下，文学的革命性叙述在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中不能不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社会和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主题中，革命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革命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总结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美国比较现代化研究学者布莱克曾经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和历史主题表述为在回应外来挑战的基础上，建立政治共同体和实现以经济腾飞为动力的文明结构转型这样两个大的历史段落和两大基本主题。他还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前一段落的主题，即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的权力转移，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导向的、高效率的、开放的政治共同体，为未来的经济腾飞和文明结构转型创造前提，其间尖锐的革命斗争通常可达数代人之久。这在西方是这样，在中国更因为现代化运作背景的严酷——人口过剩的负累、民族的生存危机以及国家的四分五裂，这种种半殖民地社会带来的恶果，更使得为建立现代政治共同体而作的斗争变得漫长曲折、尖锐剧烈。^①其间，有着两次重建现代国家（中华民国取代清王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斗争和国家形态内部更换领导集团或领导核心的斗争。由此可见，正是为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主题的特殊性所决定，一方面，现代化涵盖了革命化，却不能取消革命化。革命化在中国被极度地强化，因而是革命推动了现代化，现代化的权力分配和资源配置就是在革命和战争中进行，现代政治共同体也是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取得和建立的。另一方面又要看到，革命化推动了现代化，却不能替代现代化。现代化对革命化有着涵盖、渗透和终极指导的作用，因为无论革命化道路如何曲折漫长，它自身不是目的，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制度变革和文化建设，满足广大民众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需求。因此，革命化与现代化相辅相成，交织发展，最终汇入到现代化的历史总进程中去。我们既应该珍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现象

^① 参见许纪霖、陈凯达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9页。

和作家作品的革命化因素，同时又要发掘出过去在革命化过程中被湮没了的现代化因素，用现代化眼光重新透视革命化过程，进一步总结其间的经验、教训，概括出新的发展规律。

3. 人本性：重铸民族灵魂的现代人学核心

现代化，归根结底离不开人的现代化。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它的现代化，必须建构新的人学结构，楔入民族灵魂重铸的现代人学核心，才能探索文学现代品格特征的底蕴。关于文学现代化问题，我国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已故的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王瑶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文学的现代化包括“语言现代化”、“思想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而在这三个方面中，“人的现代化”是“更重要的目标”，这个目标体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①王瑶的论述是很有见地的。因为我们知道，“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现代含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强调文学中人的主体性，不仅是外在行为的主体性，而且是以不同个性、生命存在为基础的、体现着人性复杂深广和情感丰富多变的内在情性、内在身体生命的主体性。由行为的主体性到情性主体性再到深层多样的身体生命主体性，这正是在现代文明迅猛发展情形下人类认识运动的重心转向自身，不断认识自身，丰富、完善和发展自身的结果，这也正是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同时，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结果。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清末，由于政治、伦理一体化的封建官僚帝国体制的超稳定性统治，和以儒学为主的文化传统出现全面危机，明末清初曾一度兴起的个性思潮和实学思潮遭遏制，文学也在提倡宋学、汉学等复古浪潮中失去了对人生的观照与人文理想的探索，失去重情、求变、师心、抒愤的个性意识，文学的人学核心被挖空，因而导致主体性失落，出现严重僵化的状态。在中国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国文学由古典型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表现为具有现代意义的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而人的自觉又具有首要意义。这就是说，从中国现代化启

^① 王瑶：《〈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编，中国城市出版社1989年版。

动之时起，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主题一直潜在地支配着、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而这种对文学的支配和制约，最根本的就是要在人的现代化的基础上，在作家、作品、社会（文化）和读者的诸多维度上，建构起文学的人学核心。也就是说，要在文学活动多维度的空间里将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感情与理性、审美与功利等“人”的内涵中诸多关系，加以区分对待又互补交融起来，以呈现生气灌注而又杂多丰富的人的生命自身、人的精神主体。显然，这种生命系统、精神主体是在中西哲学人文、文艺美学思潮中形成的。仅从文学思潮来看，在现代中国，就不仅贯穿着文学的政治功利价值和意识形态化思潮，贯穿着倡导现代理性精神、主张科学与民主、辟人荒、进行现代人的发现的启蒙主义思潮，而且如上所说，还贯穿着注重个体生存的悲剧，对启蒙主义理性原则持怀疑反叛态度，在人的发现的同时意识到人的分裂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这里，应该特别看到，从现代中国文学特有的人学复杂建构中发现这种思潮是更能体现“现代性”人学特征的。这种思潮从其渊源关系上说，它既是西方现代文明走向危机阶段的产物，又是对这种文明的深刻反思和强烈抗议。上面曾经谈到，“现代性”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作为一个生命系统，它是不断发展、更新的动态概念。在现代中国文学“人”的概念中，不仅个性意识与群体意识、民族观念，人性解放与启蒙思想、意识形态性是对立统一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人的发现、人的讴歌与人的怀疑、人的分裂，自我歌颂、个性张扬与自我审察、个性批判也是对立统一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切关于“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都交汇到现代中国文学民族灵魂重铸的人学主题中去。

概括地说，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一种新的生命之流，在现代化历程中显示出它的某种独有的现代品格特征。要研究这种“现代性”和“现代品格”，只有把握它一贯的发展脉络和共同的基本特征，才能在“全球化”语境下，探索其真谛，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文学资源。

二、生命“链接”：中国 20 世纪文学现代品格的阐释形态

生命之流，一切皆流，无时不流。生命之流中任何事物、任何时相都不是普遍永恒、凝固不变的。如鲁迅的思想所启示，任何事物、任何时相都是纳过去和未来于现在的“中间物”，“中间物”存在于过去与未来发展过程中；或者说任何人的生命都如“生命之川”中的一滴，都含着向前和反顾，都承着过去，向着未来，这一滴作为此在的生命，才能赋予过去和未来以生命，才能使不在场在场化。因此，中国新文学作为生命之流，它的现代品格特征是存在于先在的文化预设与后继的不断地接受和阐释之中；而它的存在又能改变先在的文化预设并使以后的接受和阐释具有创造的活力。再者，生命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又使新文学的生命之流在发展变迁中具有容涵丰富、多变复杂的特点。上述生命之流的特征从新文学的阐释形态中可以得到清晰地揭示。

可以看到，中国新文学现代品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密切地伴随着对这种品格的接受、阐释进程。只要我们深入到历史上新文学品格与接受、阐释的关系中去，便可以看到一个丰富多彩而又绵延变异的接受、阐释中的新文学生命世界。这里，在 20 世纪特定的历史时空内，对新文学现代品格特征的理解以及对其接受、阐释关系的把握，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并进行探讨：

首先，原创性的品格特征与独创性的阐释相结合，即文本的历史化与历史的文本化的独特结合。

一方面要看到，在全球化背景下，与现代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文学品格，它作为特定时空的一种历史话语，有着被确认的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它以其不容置疑的现代性、革命性、人本性、审美性等诸多特征，从而形成一种与中国古典文学形态截然不同的宏大的总体性历史叙事。这里，现代性作为一种确定性特征是贯穿新文学现代品格的核心。在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表现为，个人主义和国民性等启蒙话语与民族国家观念相融合；由器物而制度而思想文化的现代性发展导致人的发现、新的艺术精神的觉醒与科学的发现；接着，政治、经

济先行思想文化后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精神的缺失的局面，又导致在政治意识形态制约下人的精神价值与审美自由追求的受限，科学理性和知识系统“价值中立”立场的丧失。正是这种由革命、审美、学理、崇众、尚用等多种维度构成的意义空间，赋予了新文学品格以特定的内涵，使其具有历史品格与现实品格；同时，新文学经典作家又以其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原创的艺术世界，揭示了丰厚久远的文化内涵与人性意蕴，使其具有超越品格与恒久品格。正是这样，20 世纪中国新文学经过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特别是经过文学史的历史叙述，这种种文学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在萌生与勃兴、发展与曲折、成熟与繁荣的历史进程中，铸就了一批权威性的文学经典，新文学整体也成为一种经典性的存在，一种总体性历史元叙事。

另一方面要看到，如前所述，由于有着“两个西方”、“两个全球化”，现代性有着强烈的反思性和问题意识特征，因此，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品格又不是凝固不变的绝对化和终极性事物，它的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框架时时处于被阐释、被接受、被解构的过程中，显示出特有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特征。受多种思潮左右的对新文学品格的阐释变得多种多样。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对新文学现象的确认与阐释呈现出明显的相对性特征。到了有批评家和广大读者参与创造，以批评家和读者的主动性来实现文本的完整性的接受美学评价时，文本开放的自由度和阐释的空间又要大得多。八九十年代“重读大师”与“重写文学史”热中种种对大师、经典和新文学现代品格的重新研读与评价等，便有着明显的个人阅读与接受的特征。后现代解构思潮的影响，其价值多元、意义的不确定、阐释的冲突等主张，作为解构策略，展开文本差异，促使文本裂变，更对新文学现代品格进行拆解、戏拟、拼贴。因此，用机械的眼光来看新文学品格特征，看不到它们的延传变异的特点，不符合新文学品格本身的含义，也违背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历史事实；而相反的极端，只有“当下”没有“往昔”，只有“我”没有“我们”的绝对化个人阅读，则无法操作、交流和创造，无法进行历史阐释，也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新文学现代品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的。

其次，品格特征的体系性阐释与体验性阐释的结合，即阐释中范式的转换与范式的充实相结合。

这里，新文学现代品格的阐释应该摒弃抽象机械的教条与极端个人化主观随意性的伪阐释，它既要求回到新文学现象本身以及产生它的历史原初语境，是一种向新文学历史本身趋于还原的阐释的科学形态；又因为 20 世纪文化主体性增强、转型中中国社会变化发展迅速，阐释活动的视角转换多、幅度大；诸多阐释之间往往发生矛盾冲突，因而这种阐释的科学形态又呈现出开放、多元和超越性特征。这里，对新文学现代品格的开放、多元、持续的阐释存在着宏观体系性阐释与微观体验性阐释两种不同的叙事体系，这两大叙事体系也就是阐释范式的转换与范式的充实的结合。

在新文学现代品格的阐释中，对新文学大师与经典作品的阐释极为重要，如在对鲁迅的阐释世界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有着两类不同的体系性阐释。一类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如瞿秋白、毛泽东以及胡风、陈涌等人对鲁迅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阐释；另一类是新时期，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王乾坤等人对鲁迅进行的体系性研究，他们在思想观念上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创作方法上突破了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浪漫主义、特别是现代主义成为切入鲁迅本体的新角度；审美类型则于悲剧、崇高中融入悲凉、荒诞与焦灼；历史观上也打破了单纯进化论线性发展观与政治经济决定论观念，重视偶然、无序、断裂及多重话语、回环往复的发展观，因此，他们都成为鲁迅经典宏观体系性阐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代表人物。再加上茅盾、张定璜、周作人、郁达夫、萧红等人的鲜活的审美体验性阐释，李长之、平心、唐弢、王瑶、严家炎等人的独特学理性阐释，便构成了阐释中的鲁迅经典世界的丰富多彩的面貌。

阐释中的中国新文学现代品格还表现在各种新文学史、经典研究史与阐释史中。这些对新文学现代品格特征的文学史阐释仍有着如下由于体系性范式转换与体验性范式充实而带来的类型变化：

一类是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这类新文学史，以毛泽东《新民主

主义论》关于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化性质的论述为指导思想，构成史论框架。由于与中国新文学密切联系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概括符合历史的真实，加以几本重要的新文学史撰写者、主编者的深厚文艺学养在几个相对宽松时期（50 年代初的王瑶、50 年代中期的刘绶松、60 年代初和 80 年代初的唐弢、严家炎）的创造性发挥，使得这些文学史能在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范围内保持了较好的学术质量。正是经过以王瑶、刘绶松、唐弢、严家炎等为代表的新文学研究家的努力，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的经典地位被确定下来，直到今天仍有价值。这一类型的文学史明显地存在的问题是：无论从文学史观、思想与审美价值取向来看，还是从创作方法的提倡、编写体例来看，都因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观念的渗透，使经典的选择和评价显得保守、褊狭，与新文学史本身的丰富、复杂的生命系统不符。

另一类是现代精神文化的新文学史。自从 80 年代王瑶提出新文学史的现代化课题，钱理群等人提出中国 20 世纪文学史观，又于 90 年代撰写了《中国现代文学 30 年》并作为文科教材在高校广泛使用以后，这一类文学史逐渐多起来。这类新文学史的主要特点是超越政治意识形态，以现代精神文化为核心概念和贯穿线索，将人的解放和民族灵魂的改造的基本精神文化现象融合到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带来的各种现代化主题中去，还注重审美的自由，注重文学观念、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多元化的独立品格，因此这方面的著作也成为新文学具有现代性的基本保证。

再一类是注重审美独立品格的个体化的文学史。一些研究者经过对现代性文化的反思，主张突出文学内在的审美诗性品格，主张以文学的“个体化世界”和“文学的原创性”等特征穿越政治和文化，建构多元、个体化的富于原创性的文学史。在这种情形下，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大量走近文学本体的文学史。如各种题材史、文体流变史、创作方法史、形象史、语言史、中外文学关系史、通俗文学史等。这些各体文学史其中许多著作见解之新颖、内容之丰富、发掘之深刻、形式之多样，充分体现出作者多年丰厚的积累，苦心经营的匠心，也独特地展示出新文学作为生命之流拙朴丰盈的生命原色。